

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¹——校园欺凌与暴力的根源干预

黄向阳 [美] 埃利奥特·阿伦森

一、欺凌·仇恨·报复

黄向阳（以下简称黄）：尊敬的阿伦森教授，我很感激 2014 年您授权我翻译您所著的《课堂中的合作：拆拼法（Cooperation in the Classroom: The Jigsaw Method）》。您还赠送我《不让一个人生恨：科伦拜恩案之后的同情之教（Nobody Left to Hate: Teaching Compassion after Columbine）》一书。我没想到您除了《课堂中的合作》还有一本教育著作，您大概也没有想到后者会比前者更早在中国翻译出版吧？

阿伦森（以下简称阿）：不。你们在翻译《课堂中的合作》之前先译《不让一个人生恨》，我不觉得奇怪。《不让一个人生恨》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有意思，因为它探讨的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普遍问题：导致暴力的奚落和欺凌。

黄：这是一部专业见识与人道关怀相融合的著作。“不让一个人生恨”既发人深省，又很贴切，用作书名真是妙不可言。这本书聚焦校园欺凌与暴力问题，您给这本书取名为《不让一个人生恨》究竟想传达什么意思呢？您是在劝诫学生不要欺负人以免招人恨，还是在劝告老师们善待所有的孩子以免他们相互憎恨，还是另有深意？

阿：我是在看了一部很受欢迎的美国小说《鸟人》之后选择这个书名的。这部小说中，有个强硬、好斗的人物，对另一个人物非常生气，直到他对那个人有所了解；具体来说，他得知那个人曾在场残酷的战争中服役，他的一些令人反感的习惯就是由当时一些可怕的经历造成的。他对那个人的愤怒和攻击性情感因而被共情和同情的情感所调和。然后，他以超级反讽的口吻自言自语：“你最好小心点。因为你对人了解得越多，你就越能理解他们的问题，你也就越喜欢他们。要是你不小心，就没人让你憎恨了。”因为我的书关乎对人共情和同情的学习，所以我把它取名为《不让一个人生恨》，因为共情和同情可以降解仇恨和攻击性。

黄：为了影响更多的作者，这本书的中文版改名为《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您的这本书讨论科伦拜恩杀人案。这在当时是美国有史以来伤亡最大的校园枪击案。这个案子好像给您很大的震动。

阿：这场屠杀 1999 年 4 月 20 日发生于科伦拜恩高中。两个学生（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荷枪实弹，怒气冲冲，在校园里横冲直撞，枪杀了一名老师和 11 名学生。

¹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6 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儿童欺负判断发展研究”（课题批准号：BEA160074）的研究成果。

黄向阳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心理学系荣休教授。

另有 23 名学生负伤，需要住院治疗。这两个凶手最后也举枪自尽。他俩还在一些地方安放了爆炸装置。幸好因为一个简单的电子故障而没有引爆，否则伤亡会更加惨重。

黄：哈里斯和克莱伯德在杀人之前拍下了录像，他们在录像里对自己在学校长期遭受欺凌表示强烈的愤恨。可是，根据他们的自述以及一些学生的回忆，他们在学校里遭到过同学取笑和排挤。他们受到的欺凌听起来似乎并不十分严重呀。这会不会是他们杀人夺命的一个借口呢？

阿：不，我不认为哈里斯和克莱伯德是在用欺凌作杀人的借口。我认为，包容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动机。隔开一段距离看，他们遭受的排斥、奚落和羞辱貌似不多。但对年轻人来说，特别是对青春期的年轻人来说，被接纳和受重视是非常重要的，它会引发愤怒，他们需要被视为重要的人。正如我在那本书中所写的，它是美国几乎所有校园枪击事件的关键所在。

黄：请让我用另一起校园杀人案做进一步解释，这个案子发生在中国陕西省米脂县第三中学。2018 年 4 月 27 日下午放学时段，学生们遭到一个持刀男子疯狂砍杀，其中 9 人死亡，12 人受伤。凶手赵泽伟在被捕后供述，他十多年前曾就读于这所初中，长期遭受同学嘲笑。他毕业后工作和生活一直不顺。他试图向当年的同学报仇雪恨，却又找不到他们，于是把气撒向学校。赵泽伟的辩解不可理喻。没人能接受他以十多年前遭受同学欺负为由而滥杀无辜。赵泽伟父母提供了证据，证明赵泽伟当年因受同学欺凌而患抑郁症，四处求医。可是人们很难相信同伴的嘲笑和排挤会严重到让一个人心生如此深仇大恨，十几年耿耿于怀。舆论倾向于认为，这样的校园欺凌不过是这个丧心病狂的失败者滥杀无辜的借口而已。

阿：您提到的发生在中国陕西省的那起暴力事件，有点难以解释。我猜想，行凶者因为那起事件深受伤害，而在痛苦和抑郁十年之后，他可能把自己的失败和精神困难归咎于学校。他的行为当然不理智，却是可以理解的。再说一遍，切勿低估包容在青少年心目中的重要性，切勿低估那种重要性何以能延续到成年期，特别是在涉及一定程度的精神疾病的情况下。做疯狂事情的人未必是疯子。有的时候，他们会被逼得越过理性行为的边界，即使他们神智完全正常。可是，有的时候，做疯狂事情的人其实就是疯子！我同意，把这当作一条杀人的理由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可他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人们必须努力理解，这种愤怒和报仇的念头可能会在十年之后溃烂并爆发。再说一遍，这是不理智的，却是可能的。这正是我认为建立导致包容的共情和同情之所以重要的原因。这是问题的关键。这就是拆拼法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因为那就是拆拼法所做的事情。在我国，政府建议我们在所有学校都派驻警察，甚至离谱到建议我们给老师配备手枪，好让他们携枪上课以保护学生。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几乎肯定会导致更多的流血。

黄：根据“阿伦森第一定律”，行疯狂之事者未必是疯子。如果赵泽伟、哈里斯和克里伯德疯狂杀人确实是因为他们对学校怀恨在心，他们痛恨学校是因为在学校受到欺凌，而他们受到的校园欺凌又不特别严重，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持续性的轻微欺凌是不是比一次性

的严重欺凌更有可能积累仇恨。您和其他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已经用实验证明，轻罚比重罚更有可能改变人的态度，薄赏也比重赏更有可能改变人的态度，遇到紧急情况的人在旁人少时比在旁人多时更有可能获得帮助。有没有科学实验或其他证据，证明轻微的欺凌比严重的欺凌确实更有可能积累仇恨呢？

阿：不，温和的惩罚仅在特定的定义域有效：如果你想要一个人忍住不做某种特别不讨人欢喜的事情，那么，最好是设法诱使他发觉那种事情没有吸引力。通过严厉的惩罚，你不能成功地让他发觉那事没有吸引力，因为他知道他不做那种事，唯一原因是惩罚太严厉了。可是，如果惩罚是温和的——刚好能让他停止做那种事，那么，他就不能告诉自己他不做那种事是因为严厉的惩罚——因为惩罚实际上是非常温和的。这样一来，他就会说服自己，他并不真的喜欢做那种事。

这可能会影响欺凌者。但影响欺凌者的最佳方式是在他心中建立共情。拆拼法是我知道的最佳方法。我们在数百个课堂中成功地减少了欺凌和奚落。

黄：我根据自己的观察推测，严重的欺凌容易引起校方的重视，欺凌者会受到处罚，同时受欺凌者会得到及时的保护和救济，他因而不会有太大的怨恨。另一方面，轻微的欺凌既不容易被识别出来，也难以引起校方的重视，这反而使受欺凌者怀恨在心。他反复遭受这种轻微的欺凌，就会在内心积累起比一次性地遭受严重欺凌更大的仇恨。这种推测在社会心理学上有没有实证依据？

阿：这个具体问题果真有实证依据的话，那就是我孤陋寡闻了。我同意，所谓温和的欺凌者是比较难以被察觉的。但是，如果所有的学生以拆拼法开展学习，那么，包括温和欺凌者在内，所有的学生都会养成更多的共情。我还会结合这种拆拼法，以一些讲座或视频来讨论欺凌问题，解释欺凌为什么是青少年不该做的事情。

二、外围干预&根源干预

黄：“泵柄干预”似乎是您的一个独特概念，十分有趣、生动和直观。您用英文说“泵柄干预”，有人却在中文里把它译成“外围干预”。您的这种概念化是不是被误解或曲解了？能不能请您简要地解释一下对校园欺凌与暴力进行泵柄干预究竟指哪些措施？

阿：我认为“外围干预”是一个相当漂亮的翻译。是的，我发明“泵柄解决方案”这个术语，用以指斯诺（Snow, J.）的应急方案。他是 19 世纪英国的一名医生，也是流行病学奠基人之一。他在应对伦敦霍乱疫情时，注意到所有的受害者都从同一口井里取水。他的第一反应只是取走那口井手摇水泵的把手，这样就可以防止人们从那口井取水。可这无助于理解问题的根源。于是斯诺医生继续调查，发现人们把厕所建得离那口井太近，而真正的原因是厕所里的粪便。有了这种知识，他们就可以制定有关厕所修建的法律，从而预防未来霍乱

爆发。泵柄解决方案因而是针对特定问题又不了解问题根源的解决方案。由此，学校的金属探测仪可以防止学生携枪入校，却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学生愤怒到想要置同学于死地。

黄：对致命器具进行严格管控以防青少年滥用于解决同辈冲突几乎是不可能的。幸好中国人有一套自己的办法，我国有许多学校设法让学生心无旁骛，专注于学业。学生在学校少有机会进行自由的非正式的交往。学生冲突因此被控制在一个低水平之上。这算不算是一种泵柄干预措施呢？

阿：是的，一点不错。它没有把握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为什么学生们彼此之间有攻击感，为减少这些攻击感我们可以做什么？

黄：您把科伦拜恩高中枪杀案之类的事件解释为暴徒以一种极端而病态的方式对校园普遍的排他性氛围做出的回应。按照这种理解，有的人可能会把校园欺凌与暴力的根源归结为当事人的人格或价值观，因而将校园欺凌与暴力的根源干预指向当事人的人格或价值观。您对此似乎有很不一样判断和分析。能不能请您说明一下为什么拆拼法之类的措施才是根源干预呢？

阿：我们在自己的研究中查明，排斥、奚落和欺凌的根本原因在于课堂上普遍的竞争氛围，这种氛围陷学生于相互倾轧，为了好的等第分以及老师的尊重等稀缺资源而相互竞争。拆拼法是一种解决之道，因为它要求合作。合作的行为增加学生间共情和同情的情感，有助于他们看到同学们共同的人性及内在的美，使他们想一起学习，互相帮助，互不拆台。

黄：您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创立的拆拼法于 90 年代初传入中国大陆，被人直译为“拼图法”，或意译为“组合式小组合作学习”。拆拼法跟与其他小组学习模式有什么不同吗？

阿：我选择“拆拼制（jigsaw）”这个词，是因为在美国有一种尽人皆知的拼版玩具，叫作“拆拼玩具”，它是由许多切成不同形状的纸板或木头部件组成的。把它们正确地组装起来时，就拼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由此，在拆拼制中每个学生都像拼版玩具的一个部件。学生们一起合作学习时，就仿佛在拼一幅美丽的图画。

黄：中国有老师曾经尝试用拆拼法来增进课堂参与，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习成绩。您却在书中把它当作缓解学业竞争，避免学生相互仇恨，改善学生关系，培养合作、共情、同情氛围的措施加以推荐。您的分析和论述颇有说服力。可是，也有老师担心，让已有嫌隙的学生在一起学习，存在加剧学生冲突的风险。怎么让这种老师安心呢？难道说拆拼法是一种神奇的方法，可以引起学生认知失调，从而改变他们对某些同伴不友好甚至敌视的态度吗？

阿：在引入拆拼法之初，教师得提高警惕。往往在拆拼法上花掉学生好几个小时之后，他们才会开始明白以冲突方式行事有悖于自己在校表现良好的目标。在人人为提高个人成绩而行事的情境中，贬损另一个学生或许是有用的。可在拆拼法中，冲突行为会减少攻击者做得好的机会，因为我做得好取决于我密切关注你的口头表现。如果在讲述的时候，我说了一些让你不高兴的话，就会妨碍我自己学习你要教我的东西的能力——结果我们的成绩都很差。要是学生在拆拼小组里捣乱，老师应予干预，并提醒捣乱的学生，他的所作所为会使他

自己学习退步，因此他最好仔细听其他学生讲，甚至帮助其他学生表现得更好，因为他最终将从中受益。

黄：在合作学习结构中，学生们确实会为了自己良好的学业表现而帮助本组其他成员，哪怕他们之前并不喜爱这个人。我的问题是，这种帮助行为何以能够使帮助者喜爱上他们原本不喜爱的同学？您在《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一书中提及，这一切都是自我说服机制在起作用。认知失调理论和自我一致理论对这种机制有什么特别的解释吗？

阿：是的。当你帮助另一个人，帮助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的时候，会引起失调。实际上，你会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帮助这个我不喜欢的人”。为了减轻认知失调，你开始关注那个人，从他身上寻找你可能觉得有吸引力的东西。这样，你就可以说服自己，你没有做蠢事；而蠢事就是为你不喜欢的人做好事。于是为了缓解失调，你寻找积极的一面，忽略消极的一面。过了一段时间，你就可以诚实地说：“我真喜爱这家伙。瞧瞧他所有的优点！”

三、零容忍 v 同情之教

黄：从这本书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 20 年，其间美国及整个世界发生了许多事。比如，《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一书出版不到一年，小布什政府颁布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致力于提升学校绩效。这部法案的标题酷似您的那本书。可是看上去美国教育界跟您的想法大异其趣呀。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阿：《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惨遭失败。这套想法用心良苦，却有严重缺陷。由于联邦教育部根据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成绩有多好来奖励教师，无意中造孽，老师们为考出好成绩而不是真正理解材料而训练学生。他们要是向社会心理学家请教一下，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了。此外，他们并没有试图去解决欺凌问题，或者说，没有试图去增进同学中的共情和同情。

黄：《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出版几个月之后，美国发生震惊全球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从此，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动反恐战争。美国人在校园里也开展反恐行动。美国校园安全隐患似乎并没有终止于 1999 年的科伦拜恩高中枪杀案，此后还发生许多类似的悲剧。为此美国一些州甚至立法防范校园欺凌与暴力，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纷纷效仿，中国也在做类似的努力。由于一些情节恶劣、伤害严重的校园欺凌与暴力事件通过自媒体接连曝光，中国民众和官方对校园欺凌与暴力问题高度重视，高度敏感，高度焦虑，形成了绝不姑息、坚决打击校园欺凌和暴力的“零容忍”舆论和政策。总的来说，中美日韩等国对校园欺凌与暴力的反应似乎走向了您所反对的那个极端。您对此怎么看？

阿：零容忍类似于我所说的泵柄解决方案。是的，惩罚欺凌者，甚至把他们开除出学校，可能部分有效，但它并没有把握欺凌的根源——根源在于课堂学习的竞争性方面。事实证明，拆拼法通过在学生中建立共情和同情，有效地减少了欺凌。更何况，在鼓励共情的学校里，学生们会经常出面干预以防欺凌，而不只做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拆拼制鼓励学生关心同学们

的福利。必须指出的是，拆拼制本身并不能完全消除所有的欺凌，因为有些欺凌者具有病态的攻击性。对那些学生来说，必须采用心理治疗来减少他们的攻击倾向。如果治疗无效，开除便是最后手段。但是，开除并不总能解决问题，因为作恶者可能会向学校报复。

黄：严打欺凌行为容易得到舆论支持，严惩欺凌者容易赢得民心。但是，“零容忍”政策的实施效果却出人意料。2018年情人节那天，佛罗里达州道格拉斯高中遭受骇人的枪击。凶手尼古拉斯·克鲁兹采用类似哈里斯和克莱伯德的手法，在校园里疯狂开枪射杀，致17人死亡14人受伤送医。克鲁兹不像哈里斯和克莱伯德是校园欺凌受害者，而是个欺凌者，是遭到校方怀疑的危险分子。他曾因多次在互联网上发布暴力恐吓信息，被两家私立学校开除，又被两家学校拒收。他曾在道格拉斯高中就读，因为威胁其他学生，遭到校方警告，被禁止在校园内背背包。他最后因殴打、欺凌同学被学校开除。这是一个严格执行“零容忍”政策的案例，但由于克鲁兹向开除他的学校实施了残忍的报复，结局可悲。正如您的提醒，凶案的根源不是武器，而是仇恨。如何处理像克鲁兹这样的害群之马，才不让一个人生恨呢？

阿：是的，这个案子里的作恶者需要的是治疗，而不是开除。开除应该是最后的手段。具有病态攻击性的学生需要的是治疗，而不是惩罚。

黄：顾彬彬博士最近在一本中文期刊《教育发展研究》中发表《从严惩到调解》一文。她向中国教育界推荐了您的著作《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她希望中国同行从这些著作中受到启发，去改进学校生活，抑制已经疯狂、近乎失控的排他性竞争，倡导合作学习，营造友善合作的学习氛围，打造没有失败者的课堂，确保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失败或受伤害而心怀怨恨。但是，她又担心这些书中提出的种种专业措施在中国得不到理解和认同。公众有可能会认为用它们去对付欺凌显得过于软弱无力，甚至显得是在姑息养奸，纵容欺凌。您对此有什么回应，或者有什么新的想法或建议？

阿：这些就是极好的建议。合作学习并不软弱无力，见效也不慢。我们仅用六周就能显示出在共情与同情上的巨大收成。完全见效确实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我看不出有什么比这更有效。泵柄解决方案可能更快，但最终只会部分见效，因为它们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正如伟大的哲人和圣贤老子所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想补充一句：是的，但在迈出第一步之前，要确定你选择了最佳路线！

四、个案研究方法论

黄：您是迄今为止美国心理学会三大学术最高奖全得的唯一学者：《社会性动物》获得“杰出著作奖”，高影响实验获得“杰出研究奖”，拆拼法获得“杰出教学奖”。我在您自传中文版译者写的后记中读到：假如社会心理学有诺贝尔奖，您肯定是第一个获奖者。在我看来，拆拼法在消除种族偏见及人际仇恨上卓有成效，是配享诺贝尔和平奖的。

阿：唉，那是行为科学领域一位非常杰出的知识领袖林齐（Lindzey, G.），是他提出我应该获得社会心理学的诺贝尔奖。他这么说真是太好了。您还提议我为拆拼课堂应得诺贝尔和平奖，真是太好了。我很感激这样的情感。但我必须告诉您，我对奖赏不感兴趣。当然，被同侪认可为有重大贡献的人，这是非常好的。但重要的是工作，而不是奖赏。所以，获奖永远是作为一种惊喜降临的。它就像是美餐一顿之后的一块糖果——但它不是正餐。那么，什么才是正餐呢？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作为一名教员、研究人员和写作人员，令我快乐和兴奋的是发现人心如何运作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若有可能就进而运用那种知识去改善人类的境况——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改善，最后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写下我的发现，以便有权有势身居领导岗位的人有可能得到启发，找到某种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利用我的研究。做一项实验，写一本书，教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乃至这个过程本身，都让我很快活。然后又看到我的工作是有用的，甚至有可能给人以启发，这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欢喜。我的“拆拼课堂”网站（www.jigsaw.org）上有老师们需要的丰富资料。无论来自哪个国家，人人可以免费下载这套材料。我很开心将它免费赠送出去。

黄：米尔（Meehl, P.）教授曾经说过：“凡是读过您的作品的人都能轻易看出您从所做之中获得的乐趣。”您专注于做实验研究、写作和教学，乐在其中。您给教育界贡献了一种新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您对营造无人生恨的课堂氛围的专业见解令人敬佩。我认为，“不让一个人生恨”这种思想在解决国际争端中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这个冲突四起、爱恨交织的世界，您有什么建议吗？

阿：对于您提到的这个冲突四起、爱恨交织的世界，我的唯一建议是，要从长计议，不要作短视考虑。世界强国尤其是中国和美国应该从长远而不是短期考虑，为减少气候变化做更多的事情。我们还需要在国家之间建立信任，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安心地削减军事预算，把这笔钱花在人民的健康和福利上，花在帮助贫穷国家上，花在应对气候变化之类的全球性问题上。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信任——同样，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我们的孩子开始——学会相互信任，学会相互欣赏，学会合作而不是打败对方。就像拆拼课堂那样。我们人类通过进化与争强好胜建立了硬连接，但是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种连接，这样才能在与他人合作并帮助他人实现他们所期望的目标时感到快乐。

黄：您作为社会心理学家闻名于世。您与您的导师马斯洛（Maslow, A.H.）、麦克莱伦（McLellan, D.）、费斯汀格（Festinger, L.）一道，同被列入“20世纪百名最杰出心理学家”榜单，可谓心理学界一段佳话。而在我们眼里，您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研究者。您怎么会从实验室里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研究转向对现场的教育实验研究呢？

阿：当我开始读研究生时，我意在助人。我不确定怎么做到，也许就是当一名心理治疗师吧。后来我遇到了费斯汀格，他成了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导师。正是费斯汀格教会了我如何设计和实施高影响实验，去发现人心是如何运作的。而颇令我惊讶的是，我爱上了这个过程，并且开始对人类心理产生种种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检验的有趣想法。我非常擅长于做这一套，

擅长到几乎忘却初心——助人的愿望。后来，我到德克萨斯大学任教。当时，那座城市的公立小学和公立中学废除了种族隔离——不同种族的学生第一次聚在一起。于是就发生了骚乱。怒火和斗殴四起。我以前的一些研究生是学校系统的行政管理人员，他们来问我能不能帮忙解决敌意和仇恨问题。就这样，我发明了拆拼课堂。它非常成功，不仅使不同种族的学生相互喜爱，相互尊重，也使他们更有效、更愉快地学习知识材料，还使他们格外喜爱学校，格外喜爱学习。我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仅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去做好科学研究。我最终找到了机会，成为一名也可以利用这种科学能力去帮助人们的科学家。这两条线的结合是不可或缺的。

黄：围绕一起个案的研究报告或论文并不少见。可在一起个案的研究基础上写成一部专著就太难了。《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教育中做个案研究的完美典范。

阿：是的，个案研究并不容易。但是，作为一名实验科学家，我所受的训练又帮助我去审查像校园枪杀案那样的复杂情形，将捕风捉影的传闻从真实事件中剔除出去，并且透过科学社会心理学的强大镜头来仔细检查这些事件。《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为人广泛阅读和赞赏，但最令我欣慰的是，科伦拜恩高中有几个幸免于那场屠杀的学生，他们的家长写信告诉我，他们发现这本书不仅准确且重要，还给了他们更多的理解力——他们自己从来不会想到这种情形，读这本书使他们能够理解这种情形的种种事情。

黄：您做社会心理学实验，既有趣，又有创意。在《社会心理学手册》中，根据您的开创的高影响实验所总结的研究方法论，启发了数代心理学研究者。《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却是一项个案研究的成果。个案研究跟实验研究很不一样吧？作为研究者我们很想分享您做这项个案研究的方法论经验。

阿：是的，当然很不一样。实验是非常精确的，在社会心理学中，一个好的实验，巧妙设计，精心实施，就像一件艺术品。做个案研究需要一套不一样的技能。但是，正如我对之前问题所作的回答，做一名优秀的实验者对于做好个案研究是一个极其有利的条件，因为，作为一名实验者，我对准确性和精确性怀有莫大的尊重，所以我就这起事件对所有被告知的东西都进行了最高标准的审查。不给漫不经心的推测和毫无根据的假设留有余地，这是至关重要的。做个案研究时，必须从硬数据出发，再向外拓展。

黄：研究方法包含大量默会知识，通常从教科书中学不到，只能从做中学。可您在自传《绝非偶然》中津津有味地讲述您做实验研究的故事，将您在实验中形成的默会知识转化成了显性知识，从而让我们分享到您宝贵的实验研究经验。我们期待在您新版的自传中读到您做个案研究的故事。

阿：您提的问题很有趣。我很乐意尽我所能清晰而全面地回答，同时保持简练。我也非常想将拆拼制献给中国人民，我把您视为我这一崇高事业的好伙伴。

选自《教育研究》2019年第12期